

王世襄「玩」遍京城無敵手

□李培

2009年11月28日離世的王世襄生於1914年，民國剛剛成立，父親在清廷任官，母親是畫家，年輕時就讀於燕京大學。起初，他和晚清綺子弟一樣貪玩，但裹挾在20世紀的時代動盪中，他幾乎飽嘗了一個文化人所有的起伏，最終在國難之下進入故宮工作，從單純的「玩」轉向了學術研究和收藏，在文物學家中獨樹一幟，被公認為名副其實的「中國第一玩家」。

中國記憶

王世襄生前有一句名言：「一個人如連玩都玩不好，還可能把工作幹好嗎？」讓人感嘆的是，他玩的很多都屬於旁門偏道，卻又把這些屬於民俗範圍的「玩意」玩出了大名堂，也許這能解釋為什麼他被稱為「京城第一大玩家」。

架鷹走狗鬥蝓蚰

少年的「王家二少爺」養狗、玩葫蘆、養鳴蟲，在北京城可以算得上是小有名氣。他玩過一隻白鷹，那是鷹中絕品，當時叫價一百塊錢，而一袋洋麵粉才兩塊五。王世襄破天荒頭一次託人借錢，買走了這隻白鷹。雖然家中有私塾老師教經、史和詩詞等，但王世襄從小的心思都不在學業上，他對自己的判斷是：「我自幼及壯，從小學到大學，始終是玩物喪志，業荒於嬉。」

但王世襄的好友啓功卻不認同這種說法，他說，王世襄的「玩物」是「研物」，他不但不懈怠，反而立志。其實，許多被人看作是玩東西，在王世襄眼裡都是艱苦的學問。他曾說：人生價值不在擁有事物，而在觀察賞析，有所發現，使之上升成為知識，有助文化研究與發展。他把架鷹走狗鬥蝓蚰這些「遊手好閒」的東西加以描述和總結，使之升格，一變而成為文化。

即使再「雕蟲小技」，王世襄都「玩」出了名堂，他曾經出版過《中國金魚文化》、《竹刻藝術》、《北京鴿哨》、《蟋蟀譜集成》、《說葫蘆》、《明代鴿經濟宮譜》等等。他收藏的東西除了傢具這樣的大傢伙，還包括蝓蚰罐、鴿哨這樣的小玩意兒，同樣都非常精深而成一領域之專家。

著作半年重印四次

儘管後來被打成右派並被故宮除名，無論人際遇如何，王世襄從未放棄陽光的心態、豁達的心胸，他的興趣幾乎無所不涉，並由玩而成家。除對書畫、雕塑、金石、建築諸多方面有精深研究著述外，他還花費畢生精力投入那些當時尚較少有人注意的領域，包括傢具、樂器、漆器、匏器、刻竹、金石牙角雕刻、匠作則例等，如象養鴿、鷹、犬、蟋蟀等的專用工具等，都有豐富的收藏和深入的研究，在文物學家中獨樹一幟，被公認為名副其實的「中國第一玩家」。

2000年，86歲的王世襄將自己一生所寫的大部分文章交由三聯書店以《鋪灰堆》為名出版，書中涉及傢具、



王世襄被公認為名副其實的「中國第一玩家」

漆具、竹刻、工藝、則例、書畫、雕塑、樂舞、憶往、遊藝、飲食、雜稿等十二類。這套奇書出版後一紙風行，成為從事收藏和鑒賞者的必讀書，半年內重印四次。

著名文物專家羅哲文說：「在文博界，王世襄可以說第一流的專家，年高、資深，當然術業有專攻，很多專家某一方面的研究可能很深，但是能夠像王世襄那樣既深又博的，卻很難找到一個。他的生活環境、經歷、個人關係很多方面造就了他「京城第一玩家」的地位，現在很難再能夠出像他這樣的人。」

全家擠在櫃子裡

王世襄在京城還有一個外號，叫「櫃人」，其一是因為「櫃人」音同「貴人」；其二是因為王世襄家裡的古代傢具實在太多，連自己的傢具都沒地方擺，老先生有時晚上睡覺只能睡在櫃子裡。

黃苗子第一次走進王世襄家時便驚訝地發現，精美的明代傢具居然堆滿了王世襄家中的房間。高條案下面是八仙桌，八仙桌下面是矮几。有的明代傢具就成了家中的用具。光滑而顯露木紋的花梨木長方桌上放着花瓶罐罐，紫檀雕花、編藤面的榻上，堆放幾床被褥，就是主人的床。大書架邊上的坐具是帶腳踏的南官帽大椅，結構精美的明代臉盆架上搭放着待洗的衣服。黃苗子和郁風看見，王



利園山道話滄桑

矗立於銅鑼灣的利舞台大劇院，曾是香港的著名地標

昔日香江

余也

昔日的香港八景，有一景名為「鵝頸榕蔭」，就是指灣仔鵝頸橋和當年利園山上那棵有名的大榕樹。

老街坊或許記得，利園山道並非是憑空想出來的街名，因為昔日那裡確曾有過一座山，也真的有過一個利園，但那已是半個世紀以前的往事了。

下環一座「渣甸山」

據說，在本港開埠初期，渣甸洋行就在今日自鵝頸橋至銅鑼灣一帶投得了大批地皮。當年這一帶全是他們的勢力範圍，稱為「東角」，俗稱下環，以區別於當時最早開發的地區中環、上環、和西環，而合稱「四環」。

那裡本來有一座土山，由於周圍風景秀麗，依山傍水，於是築起了許多職員宿舍，這座土山亦稱為「渣甸山」。

其實，早在渣甸洋行未遷來以前，這一帶原本是直伸入海的山崗，古名飛鵝嶺，附近的摩理臣山（位置在今日的摩理臣山道，摩理臣是昔日在這裡辦校和傳教的神父），就是飛鵝嶺的支脈。

鵝頸涌流水淙淙

大抵是因為這一帶的地形似鵝，所以附近許多地方都以鵝為名。未曾開闢以前的渣甸山，據說像一個鵝頭，故名鵝頭嶺。今日沿著堅拿道出海的暗渠，以前是流水淙淙，景致迷人的鵝頭涌。此外還有一座鵝尾峰，在早年峽道防務醫院一帶。

渣甸山後來賣給了一位富翁，那是遊樂場新興事業的年代。當時，西環先有了「太白樓」，北角有了「名園」，跑馬地也有了「愉園」。買得渣甸山的姓利的富翁，也在山上開設了後來居上、規模最大的遊樂場，命名為「利園」。可是，利園遊樂場開了幾年就停業了，而那座山卻仍被人叫作「利園山」。

昔日利園遊樂場

利園歇業後，原有的房屋設備始終被保持着，一部分改成學校，山上的袖海堂、草亭茅舍和那棵著名的大榕樹，仍吸引了不少遊客。在四十年代，這裡亦曾是多家影片公司的外景場地。

至五十年代初，利園山由於改建為商業和住宅樓宇，這才移山倒樹，滄海桑田，化丘壑為康衢，成了今日的光景。據說，當年點綴園景的一座大觀音塑像，在一夜之間成了「無頭觀音」，曾使本港的報紙熱鬧了好幾天。

（摘自《香港倒後鏡》，坤林出版社）

「打烊」來自滬語

□盧活為

商店一日營業時間結束，暫且關上門休息，叫「打烊」。

這是由上海傳來香港的方言。例子：「夜總會打烊後，小姐和客人都離去。」

為什麼叫「打烊」？《大話方言》說，烊是熔鑄金屬，店舖日間收了碎銀，夜裡把它熔成大元寶。（大意）也有人認為，「烊」可拆字成爲「羊、火」，諧音「洋火」，現時叫「火柴」。打烊作「找」。

打烊，是說商店在日間營業，到入黑後關門休息，而東主就找火柴點燈，在燈下算帳。（摘自《香港話一知半解》，獲益出版社）

遊山玩水

肇慶八卦村

八卦村位於肇慶市郊。從深圳驅車前往，三個多小時就到了。八卦村按八卦原理布局，依崗而建。直徑六百米的「八卦」，由20圈房屋組成。一幢幢房子構成一個個圓圈，結構整齊，圖案優美。每進一圈，房屋遞減，至崗頂最後一圈房屋，僅十多間。八卦村建有16座祠堂，這是其中一座。上面「革命」，下面「傳統」，和諧共處。

□懷舊堂主 圖、文

康有為自撰壽聯

□梁羽生

康有為（1858—1927年）在甲午戰後，曾聯合赴京會試的舉人一千三百餘人上書清廷，要求拒簽中日和約，還都抗戰，變法維新。他的早期思想以強調能「變」為主，認為「變是物之理」，利用今文經學，提倡「託古改制」。1898年的「戊戌維新」就是他和他的弟子梁啟超作為領導人物的。在「康梁變法」時期的康有為，應該說是對中國的歷史起了一定的進步作用。可惜他後來堅持保皇復辟，反對革命潮流，這就無怪章太炎要罵他爲「妖孽」爲「賊」了。

民國六年（1917年），他在六十生辰之時，曾自撰一聯，貼於祝壽戲台上，聯云：

傀儡曾逢登場，維新變法，備歷艱辛，廿年出奔已矣，中間灰飛劫易，幾閱滄桑，壽人笙磬忽聞，北海歸來如夢幻；歌舞業經換劇，得失興亡，空勞爭攘，一世之雄安在？此時霧散煙消，徒留感慨，老子婆娑未已，東山興罷整乾坤。此聯對他當年政治活動的失敗，吁嗟不已，而下聯最後兩句，更透露「雄心尚在」，力求「東山再起」之念。其後不久，他果然就當了軍閥張勳的謀主，發動復辟，但不旋踵爲段祺瑞擊敗，「復辟」曇花一現，爲天下笑。

康有為五十生辰時，亦曾撰一自壽聯云：

天乎百億萬千劫；丘也東西南北人。

下聯是孔子說的話，康有為以繼承孔子之學自任，因而有「康聖人」之稱。此聯亦是以「今之孔子」自居的。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他因「戊戌變法」失敗，逃亡日本，至1907年他五十歲時，仍是通客身份，故自稱爲「東西南北人」，以示感慨。（摘自《名聯觀止》，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袁水拍在香港的文學活動

□余炎光

詩人軼事

袁水拍（1916—1982）筆名馬凡陀，江蘇吳縣人。早年在銀行工作，後任《新民報》、《大公報》編輯。建國後曾任《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中宣部文藝處處長。著有詩集《馬凡陀的山歌》、《馬凡陀的山歌續集》、《春鶯鳴》等。

文字清新幽默有趣

袁水拍，江蘇蘇州人，原名袁光樞，水拍是他寫詩以後所用的筆名，是中國著名的作家、詩人。早年畢業於蘇州藝術專科學校，學美術。後來考進中國銀行當練習生，上海戰爭發生後調到香港分行工作。他的文學活動是在香港開始的，當時他由愛好繪畫轉而寫起小文章來，繼而愛好作詩，四〇年代以《馬凡陀山歌》風靡全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擔任過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處長、人民日報副總編輯、文學研究所所長、中央文化部副部長等重要職務。

一致認爲袁水拍已是一個成熟的詩人。一般人難以想像，這個銀行小職員，只是用了兩年多的業餘時間，便成長爲中國著名的年輕詩人。

1941年，他寫了不少詩，在香港的《星島日報》、《大公報》、《華商報》上，均刊有他的作品。

香港淪陷後，袁水拍於1942年初渡滬離港，在中共的東江游擊區作了短暫逗留便返回重慶。

從1944年起，他用馬凡陀筆名，寫了許多諷刺山歌，這便是後來獲得好評的《馬凡陀山歌》。

1946年底，在本港一次文藝工作者的座談會上，與會者絕大多數都肯定馬凡陀的方向是詩歌發展的一個值得肯定的方向。

任大公報文藝版主編

由於馬凡陀的山歌對國民黨政權的諷刺，引起了國民黨當局對袁水拍的注意。爲了安全，袁水拍於1948年辭去了在上海中國銀行較高的職位，被迫轉移到香港。這時，他以專業作家身份寫作，香港幾家報紙都發表了不少他的詩。

1948年12月12日，他出席「文協香港分會」的歡迎會上，發表了吟詩般的演講，說香港「陽光很好，空氣很好」，表述他離滬來港的感受。1949年1月，《大公報》副刊改版，袁水拍以馬凡陀筆名，出任「文藝版」主編。

袁水拍自己擅長寫民歌，也支持其他詩人寫民歌。1946年，他在《華商報》發表了一篇題爲《香港的戰時民謠》的文章，肯定名詩人戴望舒寫民謠的做法，認爲這是順應時代潮流的必然趨向。

1949年4月27日，袁水拍離港返回內地前夕，出席了香港文化工作者慶祝南京解放大會。他在大會上朗誦了新作《蔣介石害人精》山歌之後，又即席創作了《約法八章》山歌一首，受到與會者的熱烈歡迎。離港前後，他還在本港報紙上發表了多篇詩文。由於這時中共在全國勝利已成定局，所以他的詩文多是爲歌頌中共勝利而作。在4月發表的《保衛和平》一詩中，他說「人民的力量打倒了蔣介石」。

5月發表的《我盼望這樣一天》，則認爲「文藝節變成人民的節日」。

6月1日發表的《詩人節的一點感想》更提出了「文學藝術屬於人民，爲人民服務」的看法。至於《在一個黎明》詩作，則是描繪了上海解放的新景象；這是他回到上海以後才創作而寄來香港發表的。（摘自《中國名人在香港》，香港教育圖書出版）